

社会革命时期中国统一战线的社会内生性

肖存良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中,宗法掩盖阶级,阶级分化并不明朗,存在大量的中间阶级,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任何致力于领导社会革命的政党都面临着从中间阶级中发掘社会革命力量的问题,都需要与中间阶级和中间阶层建立统一战线,增强革命力量,削弱反革命力量,所以统一战线具有社会内生性。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内生性并通过统一战线嵌入社会。

关键词:统一战线;社会内生性;政党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09)05-0056-05

统一战线是革命政党社会革命时期的政策策略,因为这种策略首先是要面向社会各阶级阶层,也是革命政党的社会策略,所以统一战线的前提是要了解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才能决定联盟谁,反对谁,也就是确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要了解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首先要对社会性质、社会本质、社会特征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现状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只有在全面掌握社会本质的基础上才能确定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中,宗法掩盖阶级,阶级分化并不明朗,存在大量的中间阶级,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所以致力于领导社会革命的政党都面临着从中间阶级中发掘社会革命力量的问题,都需要与中间阶级和中间阶层建立统一战线,增强革命力量,削弱反革命力量,所以统一战线具有社会内生性。

一、宗法掩盖阶级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本质是宗法社会,从社会经济形态上看是以农奴制经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经济结构是“由许多农奴结合于若干

庄园而构成国,由多数国而合成天子的天下。”^[1]农奴庄园经济这种自然经济状态决定了宗法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军事上看,宗法社会中,“由卿大夫家兵合成诸侯的国军,诸侯的国军合成天子自己的军队。天子自己亦有军队,其军队的构成,则出自农民。”^[2]宗法社会中的经济、军事和宗法结构维系了封建社会的运转,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由诸侯构成,国家有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诸侯有诸侯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诸侯则由宗族构成,支撑宗族的经济基础是农奴制,而维系这些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是宗法关系,它由尊祖观念和敬天观念相结合,即所谓敬天法祖。“这种制度的作用第一是尊祖,第二是敬宗,第三是收族。而其特质是父系,父权,父治。其系统在直的方面是嫡长子继承,在横的方向是‘以弟事兄,以兄率弟’。至其精神在‘尊尊亲亲男女有别’。”^[3]这种国家结构形式,由宗法而形成贵族。贵族是特权阶级,来自于血缘关系,连接着上层和基层,成为这种国家结构形式的一种支撑性力量。

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推动下,秦朝统一中国,消灭诸侯,废分封,立郡县,灭贵族,建立郡县制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正式

收稿日期:2009-08-14

作者简介:肖存良,男,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学术秘书,政治学博士。

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社会形态上看中国进入了中华帝国历史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宗法制度也被抛弃,但是宗法制度虽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被抛弃,而宗法制度的“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精神却被作为儒家精神被后世保留下来,父系、父权、父治的理念被后世统治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采纳,并把它上升为意识形态,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长达两年多年的帝制时代,这些儒家理念都作为基本的意识形态被历朝历代所继承。正因为对宗法精神的继承,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误认为中国的帝制时代是封建社会,其实从宗法制度的常态来看,它已经随着秦朝统一而从制度上消失了,它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军事结构都在秦朝统一过程中被消灭了,只是它遗留下来的宗法理念一直被统治阶级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使用而已。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政治理念逐渐被引入中国,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传统的宗法理念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冲垮它。

受传统宗法观念影响,在宗法观念与阶级意识的关系上,出现了宗法观念掩盖阶级意识的社会状况。1924年,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孙中山、廖仲恺与苏联顾问在讨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和廖仲恺赞成通过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反对在农村组织农会来直接开展土地革命。廖仲恺解释说,“中国农村情况非常特殊,宗法关系还没有打破,地主豪绅和农民都沾亲带故,同属一个姓。由于农村结构的宗法性质远强于封建性,所以阶级矛盾相当和缓,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像是叔侄之间的矛盾,而不像敌我之间那样不共戴天。”^[4]虽然实际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是在宗法关系掩盖之下,人们的阶级意识并不强烈。当发生社会冲突的时候,“尽管这种冲突根源于阶级差别,但是这些冲突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一个掠夺性团伙的形成,由宗族成员构成的可能并不比由贫苦农民构成的可能要小。有时,阶级和宗族有可能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阶级和宗族发生冲突的时候,亲属关系通常是构成一些组织的主要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典型的防卫组织是根据他们的居住地来建立的。从生态学上来看,更为安全的村子总是代表所有村民的利益来抵御来自邻近地区相对贫穷的村民的侵犯。甚至在合作防卫似乎与贫民的客观利益相矛盾的地方,服从有势力的大地主的意

志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使村民参加到防卫组织中来。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亲属关系和社区关系已经发展成为有效的迎接生存挑战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往往成为掠夺和防卫活动所凭借的载体。尽管农民斗争的根源深植于不平等的土壤之中,但是其他层面上的忠诚掩盖了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内容。”^[5]在社会冲突中,虽然从本质上存在阶级冲突,但是这种阶级冲突往往被宗族利益所掩盖,宗法观念掩盖了阶级意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指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宗法掩盖阶级的社会状况是从社会事实^[6]的角度出发的,揭示了客观社会状况,不含主观意识形态因素。整个二十世纪对于宗法观念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肯定评价,如孙中山把宗族视为民权的基础,等等。一种是否定的评价(这是二十世纪对于宗族评价的主流),认为宗族阻碍了社会进步,需要打破宗族观念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7]。对于社会革命而言,革命需要阶级分化,由阶级分化导致阶级对立,造成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以便于进行阶级斗争,而宗法掩盖阶级的社会事实不利于开展社会革命,所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8]他把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总结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9],其中族权是“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构成。对于领导革命的政党而言,要真正深入乡村,就要打破封建宗法关系,破除四权,建立新的社会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就是农会。中国共产党在乡村中打破了宗法关系,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所以就能赢得乡村;而国民党不愿意深入乡村打破这种宗法观念,反对组织农会进行农村阶级斗争,最终丧失了农村,并由丧失了农村而丧失了中国。

二、阶级分化不明朗的社会

阶级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社会团体,阶级是一种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阶级。马克思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社会之后,并没有消除

阶级斗争,反而使阶级斗争更加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1]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简单化,阶级冲突更加激烈。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来看,它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越激烈的地方。工业革命之后,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最初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后来是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成正比例。在斗争双方中,资产阶级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无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产业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剥夺了农村居民的土地区,巧取豪夺农村公有土地,又通过血腥立法把农村居民赶进工厂做工,由此就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掘墓人,所以“无产阶级通常生活在大城市里,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手工工场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一点财产,因此才变成无产者。”^[12]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只有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之后才能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存在无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不存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13]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有了资本才能有劳动,有了劳动才能有资本,而二者的基础都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就产生不了现代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与劳动分离之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造成二者之间阶级独立的简单化,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也必然在这种冲突中被大资本剥夺而回归到无产阶级的行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的社会基础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我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广大乡村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有的甚至完全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城市当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不发达,而且城乡二元分离,工业化发展缺乏社会动力。在这种缺乏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人数少,影响力小,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完全意义

上的无产阶级,自然不能产生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简单的“阶级冲突”,也不能产生中间阶级由于受到大资本的剥削而回归到无产阶级行列的情况,相反,中国社会最大的部分是中间阶级。所以,从阶级分化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只能是阶级分化不明朗的社会,社会上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且这种剥削和压迫还很严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不发展,所以这种冲突并没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并没有打上明显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的烙印。而且由于封建宗法观念的存在,这种剥削和压迫还掩盖在封建宗法关系下面,社会发展程度还没有“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掉。”所以梁漱溟先生据此提出中国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不存在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也就谈不上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一面没有经过产业革命,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之趋势不著,一面循着遗产诸子均分之习俗,资本纵有积蓄,旋即分散;所以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象近代工业社会劳资两阶级之对立者,在此谈不到,所不待言。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14]因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朗,所以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不体现为阶级对立,而是体现为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前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在中国城市当中,因为工业化程度不够,所以难以产生大量的无产阶级。而在乡村,除此之外还加上宗法掩盖阶级,乡村之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不严重。从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来看,造成乡村阶级分化不明朗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第一,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阶级较多,自耕农在阶级划分上都属于中间阶级。第二,土地自由流转使得土地在不同阶层之间上下流动,使得乡村真正的大地主较少。第三,遗产继承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遗产在男性继承人之间平均分配,这也破坏了土地集中^[15]。综合这些因素,使得乡村看不出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的清晰图景。

三、中国社会的特点:两头小中间大^[16]

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但是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并不明朗,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社会是一个平铺化的、散漫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

具有什么特点呢?毛泽东在通过对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7]生活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只占少数,相应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大资本家也只占少数,生活在农村中的大地主也是只占少数,所以对革命政党领导社会革命而言,首要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阶级,以共同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8]。

在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中,城市无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他们不但要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还由于大工业都集中于沿海地带,而沿海地带又大多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受到了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且相互隔绝,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虽然他们是现代社会的掘墓人,但是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程度不够,导致无产阶级本身力量不强,另一方面又受到如此严重的压迫,所以他们可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但是它们自身的客观不足决定了他们难以单独承担起社会革命的主体功能。

在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中,乡村中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比人数要多得多。“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19]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的人口总和为五千万,其余三亿五千万都属于中间阶级。所以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城市无产阶级受到压迫最深,但是他们与外界隔绝,所以需要启发他们的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使他们成为社会革命的先锋,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仅仅依靠他们并不能完成社会革命,他们的力量还太单薄,而中国的反革命

力量又太强大,所以有必要联合乡村中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农和贫农,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工农联盟。国民党虽然是国民革命的象征和革命中心,它表面上获得了各个阶级的支持,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放弃了乡村。

四、统一战线:争取中间阶级

由于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朗,社会特征两头小中间大,所以任何致力于领导社会革命的政党都必须注意中间阶级,从中间阶级中发掘出支持自己的力量,与中间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扩大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并孤立敌人。而所谓的统一战线主要就是与中间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特征决定了统一战线的社会性,只要社会阶级结构还是这种结构,那么这种社会就内在地蕴涵着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当然,社会内在地蕴涵着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即统一战线的社会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统一战线的社会现实性,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还需要政党的领导和自觉。

既然在社会革命过程中,谁拥有中间阶级的支持谁就拥有未来,那么,中间阶级具有什么特征呢?他们是否会主动成为革命的动力呢?马克思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20]中间势力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生存的保守的力量,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是革命的积极动力,而社会革命的成功又离不开中间势力,需要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教育他们,使他们摆脱保守性,由保守性转为革命性,由代表当下的自己转为代表将来的自己。由此看来,教育中间阶级是革命党建立并维持统一战线的前提,而要能够教育中间阶级,必须保证革命党自身的先进性,由革命党自身的先进性来教育中间阶级,把中间阶级纳入到统一战线中来,领导他们共同完成革命任务。这也要求政党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期,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

中,“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一边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不可能一开始就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2]统一战线的社会内生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成功要建立统一战线,同样,中国国民党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也要建立统一战线。建立统一战线是革命政党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视为领导革命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不断争取中间势力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一旦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间势力的全力支持,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国民党从来没有象共产党一样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统一战线。实际上,与共产党一样,从国民党的历史来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它的事业就取得成功,而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它的事业就失败。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取得了北伐的成功,国民党从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党、小政府转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党和大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就陷入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被动局面。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破裂更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丧失了政权。

分析至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革命时期是社会内生的,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反映经济结构的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统一战线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遵循着统一战线自身的逻辑,革命政党就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而偏离了统一战线自身的逻辑,革命政党在社会革命道路中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领导社会革命的两个政

党,其自身的历史都在这个逻辑之内,都印证了这个逻辑。而统一战线作为上层建筑,其根源还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中。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统一战线自身的逻辑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 [1][2]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34,134-135
- [3]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2.25
- [4]黄彦主编.只有组织和武装农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501,500
- [5][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260
- [6]社会事实这个概念是迪尔凯姆提出来的,迪尔凯姆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社会方法的准则》第34页[法]迪尔凯姆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版)我们要把社会事实作为一种物来考察,社会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组固定的社会现象,它排除了个体心理和集体心理对社会现象的干扰,它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
- [7]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之一)
- [8][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15,31
- [10][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250,251,214,257
- [14]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51
- [15]王中汝.关于阶级问题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2008(3)
- [16]我们这里所指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特征并不是指社会分层结构而言的,而是从人口的阶级地位划分而言的社会阶级结构,如果从社会分层结构来看,从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三个指标综合来看,当时的社会肯定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的社会。
- [17]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808
- [18]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783
- [19]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29
-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261-262
- [21]“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4,30-32.转引自王中汝.关于阶级问题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2008(3)

(责任编辑:顾文浩)